

宋本方輿勝覽

宋本方輿記

宋本方輿彙覽

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咸淳刻
本影印。書中漫漶缺損文
字，經參校北京圖書館藏
本照片清出，並補祝洙跋
四葉、錄白一葉。

前言

譚其驥

——論《方輿勝覽》的流傳與評價問題

《方輿勝覽》七十卷，宋祝穆編，穆子洙增補重訂。

祝穆字和父，建寧府崇安縣人。先世徽州歙縣人，曾祖確，是朱熹的外祖父。父康國，始移家入閩。穆少時名內，嘗受業於朱熹。除本書外，又著有《事文類聚》前、後、續、別四集，共一百七十卷，今存；《四六妙語》（一作《四六寶苑》）若干卷，今佚。

洙字安道，寶祐四年（1256）進士。嘗取諸家語錄為朱熹《四書集注》作注，名曰《四書集注附錄》，宰執錄其書進呈。景定中除迪功郎，興化軍涵江書院山長，咸淳初轉從政郎，監行在文思院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說祝穆是建陽人是錯的。穆父康國居建之崇安，見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九十八《外大父祝公遺事》、嘉靖《建寧府志》卷十八《人物文學》。《遺事》有云，康國「二子丙、癸相從於建陽」，這是說丙、癸二人到建陽受業於朱熹，不是說祝氏乃建陽人。本書卷首呂午序在「祝穆和父」上繫以「建陽」二字，這是建寧

府的郡名，不是縣名。祝穆自序署鄉貫作「建安」，各卷卷端署「建安祝穆和父編」，「建安」也是郡名。

洙字安道，見《經義考》卷二五三引胡炳文曰，仕履及著作見本書卷十三興化軍涵江書院條。卷末跋及嘉靖《建寧府志》。《四庫提要》將宰執錄其所著書進呈，除迪功郎為涵江書院山長誤作祝穆的履歷，此點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已指出。

祝穆《方輿勝覽》原本據卷首呂午序及穆自序，刻印於理宗嘉熙三年（1239）。全書分為前集四十三卷，後集七卷，續集二十卷，拾遺附錄若干條。《季滄葦書目》載有此書，清季楊守敬在日本亦訪得此書。據楊氏《日本訪書志》云：「自浙西路至廣西路為前集，淮東、淮西兩路為後集，自成都路至利西路為續集，「拾遺則自臨安府至紹熙府每府州各補數條」。「其分數次開雕者，當因資費不足，隨雕隨印行，非別為起迄也」。「每卷標題《新編四六必用方輿勝覽》，蓋本為備四六之用也」。

祝洙增補重訂本刻印於度宗咸淳二至三年（1266—67）。去原本梓行凡二十八年。祝洙跋文稱「先君子編輯《方輿勝覽》行於世者三十餘年」，可能是因為原本在刻印以前已經以鈔本行世，所以算到咸淳初共有三十餘年。重訂本去「四六必用」四字，不復分前、後、續集名目，又將拾遺散附各府州下，新增五百餘條，通編

為七十卷，而各路次序仍同原本。《李滄葦書目》、《天祿琳琅書目》、《皕宋樓藏書志》皆載有此書，《四庫全書》所收也是這種本；楊守敬在日本除訪得原本外，也訪得了這種本子。

祝穆原本在國內可能早已失傳^①。據近年調查，現在全國各地圖書館所藏，都屬於祝洙重訂本，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所藏同是重訂本的宋刻本，但並非同一版刻。不僅字體不同，北圖本中的繁體字，上圖本中又往往用簡體字，如國作国，雙作双，盡作尽。據此，可以認定，北圖本較早，上圖本較遲；上圖本可能利用了一部分舊板，大部分是重刻的。重訂本又有元明刻本，可是清朝和辛亥以來從沒有刻印過。

現存的唐宋地理總志，共有唐代的《元和郡縣志》，北宋的《太平寰宇記》，《元豐九域志》和《輿地廣記》，南宋的《輿地紀勝》和《方輿勝覽》六種。《元和志》、《九域志》和《輿地廣記》，既有好幾種清刻本，又有近時排印本，《寰宇記》和《輿地紀勝》，也各有幾種清刻本，都是一般圖書館備有，市上比較易得之書。只有《方輿勝覽》，由於沒有清刻本和近時印本，所以需要參考此書的，非得上少數幾家大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借閱不可，極為不便。一九六五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，決定將北圖、上圖兩個宋本中缺頁較少的上圖本（北圖本缺正

文十四頁，上圖本不缺）影印問世，又據北圖本補足所缺祝洙跋四頁，錄白一頁，和正文中的缺損文字。一九六六年，已打出毛樣，正在與北圖本的照片逐字進行核校，約我寫的前言也已寫成大半。十年浩劫開始了，這部書當然屬於「四舊」之列，「勒令」不許出版。版子埋沒在倉庫中達十多年，前年才翻了出來。上海古籍出版社當即積極將原影印計劃付諸實現。這部宋季「學士大夫家有其書」的名著，終於不日可以以宋版的面目和廣大讀者見面了。這篇前言也就以舊稿為基礎，稍加修訂補充，謹以就正於讀者。

本書編者生平 and 版本流傳略如上述。下面請再就此書和《輿地紀勝》的關係，七百年來它在學術界裏的遭遇，以及今天我們對它該如何評價等，陳述一下管見。

《方輿勝覽》的體裁迥然不同於《元和郡縣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元豐九域志》、《輿地廣記》等早期總志，而極為接近於差同時的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。主要表現在：

一、《紀勝》與《勝覽》兩書的門類基本相同，只是《勝覽》比《紀勝》少了縣沿革和碑記二門。此外如《紀勝》的景物門在《勝覽》裏分成山川、井泉、樓閣、堂院、亭榭、館驛、橋梁、寺觀、祠墓等門；《紀勝》在人物之外另列仙釋一門，《勝覽》併入人物；《紀勝》將物產附見於風俗形勢門，《勝覽》別立土產一門（或有或無）；都

只是在分合上的不同，無關實際內容。

二、《元和志》和《寰宇記》等早期總志所有的州境、四至八到、戶數鄉數等門，《紀勝》和《勝覽》都沒有。《紀勝》有而為《元和志》、《寰宇記》等所沒有的詩和四六兩門，《勝覽》也有，僅將詩改稱為題詠。

三、《元和志》、《寰宇記》只是偶或引用前人詩文片言只語，《紀勝》和《勝覽》除專闢詩（題詠）和四六兩門外，又都搜羅了大量與一地風俗、形勢、景物、人物有關的詩、賦、記敘文字，分繫於各門各條之下。

為什麼出於兩個編者的兩部書的體裁，會如此近似呢？原因有二：一是在同一時代的風尚影響之下，兩書編者的纂輯旨趣本來就相去不遠；二是《紀勝》成書於嘉定寶慶間，早於《勝覽》十餘年，《勝覽》在制定體裁時又受到了《紀勝》的影響，這兩個原因是相輔相成的。若不存在前一因素，則《勝覽》就不會樂於沿用《紀勝》的體裁。若不存在後一條條件，則儘管兩個編者的纂輯旨趣略同，兩書的體裁也不可能接近到這個程度。

《日本訪書志》卷六載祝穆原本《勝覽》卷首兩浙轉運司《錄白》云：「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：本宅見刊《方輿勝覽》，……係本宅貢士私自編輯，積歲辛勤，今來雕版，所費浩翰。竊恐書市嗜利之徒，輒將上件書板翻開，或改換名目，或以節

略《輿地紀勝》等書為名，翻開攪奪。……」這是《勝覽》的編者看到過《紀勝》的的證。但編者頗諱言其事，卷首呂午序和編者自序裏，言及本書的編纂經過，竟連《紀勝》這部書名都沒有提到。祝洙重訂本刪去了這篇「錄白」，元明以後學者由於只看到重訂本，故諸家題跋，未有能明確指出此點者。陸心源撰《宋槧方輿勝覽跋》，察覺到了兩書的相似，但又為本書序文所蔽，因而有「不相謀而相似」之說（《儀顧堂題跋》）。要是他看到了原本的「錄白」的話，那就不會這樣說了。

《勝覽》的體裁既與《紀勝》極為近似，而《紀勝》共有二百卷，《勝覽》僅七十卷，所以祝穆深恐刊行後，會被坊賈用節略《輿地紀勝》為名予以翻刻。實際《勝覽》儘管部分沿襲了《紀勝》的體例，但就內容言，却跟《紀勝》並沒什麼關係。它根本沒有採用《紀勝》作為藍本，當然更談不上是《紀勝》的節略本或改編本；它確是一部由編者「積歲辛勤」、「私自編輯」而成的新著。

《勝覽》全書約有四分之三條目皆見於《紀勝》，相同條目的釋文亦多雷同。粗看好像這些條文都有可能是從《紀勝》鈔襲過來的。但仔細一對勘，就可以知道不是這麼回事。因為《勝覽》若以《紀勝》為藍本，則《勝覽》的文字只能與《紀勝》相同或較少於《紀勝》，但事實上合乎這種情況的只是極少數，多數條目儘管內容基本相同，却多少有幾句話或幾個字，或不同，或溢出於《紀勝》記載之外。由此可見，

兩書條目與文字之所以有這麼多雷同之處，顯然不是由於《勝覽》襲用了《紀勝》的資料，而是由於兩書的資料來源相同。來源相同而兩個編者在選材與摘錄文字時取捨不免稍有差異，因而出現了這種大同而小異的情況。同出於什麼來源呢？從兩書的序文和書中所徵引的書目和篇名看來，主要應該是當時市上廣泛流傳着的那些各地圖經（方志）和諸家詩文集，而採自圖經的又較之直接採自詩文集者為多。

因為資料來源相同，所以兩書往往犯同樣的錯誤。例如：兩書嘉興府皆有「瀚海」一條。《紀勝》注云：「在華亭，西抵海鹽，東抵松江，長一百五十里。」《勝覽》同，惟省去「長一百五十里」一句。此所謂「瀚海」，實係「捍海塘」之誤，見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杭州鹽官縣下。今按，《紹熙雲間志》卷中堰閘載此塘作「舊瀚海塘」，知誤「捍」為「瀚」，在宋代方志中已然。《紀勝》與《勝覽》此條當同出於某一種嘉興舊志，該志又將「瀚海塘」省作「瀚海」。

又如：《紀勝》贛州風俗形勢引有王安石《虔州學記》一條云：「虔於江南，地最曠大，山長谷荒，交廣閩越，道所出入。」查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卷八二《虔州學記》，此節原文作「虔州江南，地最曠，大山長谷，荒翳險阻；交廣閩越，銅鹽之販，道所出入」。可見原文顯然是以「地最曠」為一句，「大山長谷」為一句，「荒翳險阻」為

一句。《紀勝》引文因誤以「地最曠大」為一句，「山長谷荒」為一句，致脫去「巖險阻」三字。《勝覽》贛州風俗也有這一條，徑以「山長谷荒」四字為標題，引文為「虔於江南，地最曠大，云云，交廣閩越，銅鹽之販，道所出入，椎埋盜奪鼓鑄之奸，視天下為多。」句讀之誤和脫字與《紀勝》相同。這一錯誤一直沿襲到《明一統志》。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「明一統志」條追本溯源，乃謂誤「始於王象之，而祝穆因之，『明一統志』又因之」。今按，《紀勝》引文略去「銅鹽之販」一句，截止於「道所出入」，《勝覽》引文不僅沒有略去「銅鹽之販」，又在「道所出入」之下多引了「椎埋盜奪鼓鑄之奸，視天下為多」兩句，足見《勝覽》此條決非出於《紀勝》，當係與《紀勝》同出於某一《贛州圖經》。兩書句讀之誤和脫字，都是從這一圖經沿襲下來的，惟引文繁簡則稍有不同。

《勝覽》的體例和內容基本上與《紀勝》相同，但亦不盡相同。同的一面略如上述，至於不同的一面，除上面所提到的卷帙多寡不同，門數條目有出入外，兩書又各有特色。構成《勝覽》的特色的是下列兩點：

一、編者特別重視四六一門，故原本以「四六必用」四字冠於書名之首。全書各門類皆較《紀勝》為簡，獨此門較《紀勝》為繁，內容亦異多同少。《紀勝》此門所載皆前人舊作，注明出處。此書所載不注出處，據卷首呂午序及編者自序，多數

始出自編者自撰。

二、在搜載詩文方面作了不同的處理。《紀勝》所載詩或整首全錄，文則例只節取少數幾句。此書不論詩文，凡被編者認為佳作的，往往整首整篇全錄。卷首特分類開列了一個《引用文集》目錄，詩文雜志，共計一七五〇篇（內一八一篇係重訂本新增）。「其一聯片語不成章者」不在內。

這兩點特色使《勝覽》在行世後廣泛流傳了一個很長的時期。因為宋人在撰寫表啟文時，例須用四六儷語，為樓閣亭堂作記叙文的風氣，也盛極一時。元明時代，四六之風雖漸衰歇，記叙文仍流行勿替。所以這部書正投合了這一段時期內文人墨客的需要。祝洙在重訂本跋文裏說原本行世三十餘年，「學士大夫家有其書」，殆非虛語。祝洙正是由於原書受人歡迎，而板已漫漶，才進行增補重訂。重訂本梓行不久，在宋末即曾重雕，在元明兩代又迭經翻刻，可見它一直是一部暢銷書。《勝覽》一經暢銷，在當時文人看來，《紀勝》已非必備之書，積久遂漸歸湮沒。明代金石家從《紀勝》中鈔出碑記一門，別為《輿地碑記目》四卷，其時全書已亡佚七卷^②。清乾隆間纂輯《四庫全書》，《紀勝》竟以未見傳本未收入。其後錢大昕始訪得一影宋鈔本，已佚三十一卷，另有十六卷有闕頁。

可是到了清代乾嘉以後，學者競尚輿地考證之學，《紀勝》與《勝覽》二書的遭

際就顛倒過來了。《紀勝》各門的條目本來比《勝覽》豐富，並且幾乎每條都注明出處，不像《勝覽》那樣時有時無；特別在建置沿革方面，《紀勝》的記載很詳細，《勝覽》則於州沿革甚簡，又根本刪除了縣沿革，所以對考據學家說來，《紀勝》當然遠比《勝覽》有用。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「輿地紀勝」條云：「此書體裁，勝於祝氏《方輿勝覽》，」正代表了這種看法。因而《紀勝》自影宋鈔本被發現後，不久就有廣陵岑氏懼盈齋、南海伍氏粵雅堂兩種刻本，《勝覽》則終清一代未見重雕。

《勝覽》盛行於宋末元明，不僅為綴文之士所重視，對當時的地志編纂，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元代坊刻本《混一方輿勝覽》，在南宋故土範圍內，幾乎全部內容都是根據《勝覽》節鈔下來的，極少差異。《元大一統志》的南宋故土部分，雖多取材於《輿地紀勝》，但其大段或全篇鈔錄詩文，還是沿用了《勝覽》所開的例。明景泰中修《寰宇通志》，其初主其事者甚至定議「採事實凡例一准祝穆《方輿勝覽》」（葉盛《水東日記》）；後來雖有所更張，因襲之處還是不少，如景物方面的門類分得很煩碎，各卷之末仍有題詠門，記序文仍全篇登錄等等。直到天順間將《寰宇通志》改編為《明一統志》，歸併了景物方面的門類，刪除了題詠門，刪除了記敘文，才基本上改變了《勝覽》以來的地志面貌。可是在此以後，創修於成化十七年而增修於嘉靖九年的朝鮮《東國輿地勝覽》，並沒有採用《明一統志》的新樣，還是

沿襲了《勝覽》的舊式。這部書實際上是搜集了《東文選》等書中的有關輿地的詩文，按祝穆《勝覽》體例，逐項分條插入成化十四年修成的《八道地志》而成的。可見《勝覽》的影響，竟遠達三百年以後的鄰邦。

《四庫提要》對《勝覽》作了如下的評論：

書中體例，大抵於建置沿革、疆域、道里、田賦戶口、關塞險要，他志乘所詳者，皆在所略；惟於名勝古蹟，多所臚列，而詩賦序記，所載獨備。蓋為登臨題咏而設，不為考證而設。名為地記，實則類書也。然採摭頗富，雖無裨於掌故，而有益於文章，摘藻揆華，恒所引用，故自宋元以來，操觚家不廢其書焉。

這段話上半段將詳於哪幾方面，略於哪幾方面，作為本書的特點，實際除略於建置沿革一點外，皆係沿襲《紀勝》而來，非本書所始創，這是由於四庫館臣沒有看到過《紀勝》，致有此誤解。下半段講到本書的作用與性質，說得也不夠確切。「為登臨題咏而設」，這是王象之編《紀勝》的主要目的，《勝覽》對登臨題咏當然也有用處，但其纂輯的目的却主要是為了備作四六表啟之用。這不僅從《紀勝》所採詩較《勝覽》為富，《勝覽》所錄四六較多於《紀勝》可以看出來，在兩書的自序裏也都講得很明白。「不為考證而設」，這句話是對的。但編者不為考證而設此書，不

等於對後人治考證之學一無用處。關於這一點，留待下文再說。

就地志門類而言，此書並不齊備，這是確實的。書中採摭詩文頗富，足供操觚家摘藻採華之用，並且這部書之所以得以流傳不廢，主要就是由於具有此種作用，這也是事實。但由此便作出「名為地記，實則類書也」這樣的論斷來，却是錯誤的。

一部書只要內容記載的是地理，就是地記，沒有理由說哪幾項闕略了就不能算地記。各種地志各有其所詳所略，並不一樣。《提要》所謂他志乘所詳的那幾項，其實他志乘並不一概都詳。《元豐九域志》的建置沿革很簡。《輿地廣記》根本不載疆域、道里、田賦、戶口。至於關塞險要，則唐宋地志全都不詳。怎麼能說闕略了這幾項就算不得是地記？更沒有理由說多載了名勝古蹟詩賦序記，就不是地記，是類書。名勝古蹟本是地志應有的內容，詩賦序記只要與一地風土有關，當然也可以收入地記，怎麼能說多了就該算類書不算地記？

《提要》這種錯誤的看法，影響很大，竟為後來的藏書家陸心源（《儀顧堂題跋》）和目錄學家余嘉錫（《四庫提要辨證》「太平寰宇記」條）等所沿襲，因此不能不予以駁正。

若把《提要》「名為地記，實則類書也」這句話改為「其書雖為地記，實兼具類

書之用」，那倒是比較恰當的。那末，能不能說這部書儘管是地志，但作為地志的價值很差，「無裨於掌故」，值得肯定的只是它所兼具的類書的作用，即「有益於文章」呢？也不能。《勝覽》的地志價值比之於它的類書價值，至少應等量齊觀，可以看成是有過而無不及。但它的地志價值不同於《提要》所謂「他志乘」，「他志乘」的價值主要在於有裨於考證建置沿革、疆域、道里，而此書的價值則主要在於提供了許多有關各地風土習俗的資料。

地志載述風土習俗，淵源甚早，在最早的地理著作如《山海經》、《禹貢》、《職方》裏，都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。可是這一傳統後世沒有很好予以繼承發展。在十六種正史地理志中，只有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、《南齊書·州郡志》、《隋書·地理志》、《宋史·地理志》四種，按當時的地理區域或大行政區作了一些很概括粗略的論述。在現存的歷代地理總志中，《元和郡縣志》、《元豐九域志》、《輿地廣記》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記載，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元大一統志》、《寰宇通志》、明、清《一統志》在各府州下雖有風俗一門，但簡略已極，且一般只從古籍中摘錄數語，隻字不及當代的情況。惟獨《紀勝》和《勝覽》兩書，其各府州風俗門採摭既相當豐富，內容古今並陳，而側重於當代，此外在題咏（詩）和四六兩門內，也有不少關於這